

N 本期聚焦

8月底以来，同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的林毅夫和张维迎就“中国政府该不该使用产业政策”展开了激烈辩论，受到了广泛关注。11月9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林毅夫与张维迎面对面“交锋”，展开了一场关于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大辩论。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张煜 美容君



产业政策思辨会现场。（图片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产业政策之辩” 林毅夫与张维迎各说了啥

林毅夫：产业政策不是政府帮企业做决定

林毅夫以“产业政策和国家发展”为主题，从他一直以来研究的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对观点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的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关税和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和补贴、工业园或加工出口区、研发补助、垄断或特许经营权、政府采购，以及强制规定等。“我们不能因为产业政策大部分都失败而就不使用产业政策了，那就像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同倒掉’。”林毅夫指出，以前世界上国家为基础，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而实现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不用产业政策的发达国家。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林毅夫阐述了一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潘塞和索罗领衔的研究。在斯潘塞和索罗领衔的这项研究中，主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持续25年平均GDP增长率在7%以上的13个经济体进行了研究，并指出，这13个经济体的成功有5个特征，即开放经济、宏观环境稳定，高持续高投资、有效的市场和积极有为的政府。

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这是本次辩论林毅夫必须要解答的问题。他指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产业结构实际上由其要素结构决定，“总要素可以看成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在每一个时点上的总预算，相对丰富的结构决定相对价格，而相对价格则决定在哪种类型的产业上会有最低的生产要素成本。”林毅夫认为，如果一个国

家某产业的要素成本在国际上最低，则此行业中的企业只要有自身能力就可以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不需要国家保护补贴而生存下来。

“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符合其比较优势，则是有竞争力的。”林毅夫说，但我们知道，低收入国家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收入国家的比较优势在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如果发展中国家要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来实现经济发展，就必须从传统的密集型的产业，慢慢地进入到资本用得比较多的制造业，最后进入到服务业。

“要最快解决产业结构升级问题，最好方式就是遵循每一个时点的比较优势来选择资源禀赋要素。”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出发对“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进行解答：如果你按照要素禀赋结构优势来选择产业就会得到最低的要素生产成本。一个产业除了生产成本还有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由软硬环境所决定，硬环境包括基础设施，如电力、道路、港口等，软环境就是制度安排，如法律、产权保护、金融的管制等。只有一个产业的软硬环境都完善了才能降低交易费用。

因此，如果政府、社会能把相应的软硬环境完善，交易费用就会降低，从而总成本也会降到最低，总成本最低就拥有最大的竞争力，拥有最大竞争力就能有更多的剩余，就会有更高的投入回报率。“这样，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就可以不断地从资本相对短缺的产业向资本相对丰富的产业进行技术转型。”林毅夫说。

张维迎： 反对产业政策 不等于否定政府作用

张维迎认为，相对于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定义，他眼中的产业政策更加“狭义”。

在他的定义里，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私人产品”和“选择性干预”是关键词，不认同把公共产品、专利保护、地区政策和普遍性政策归为产业政策。

张维迎认为，众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率高企是因为“拥护产业政策的人总是假设，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

历史证明，创新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统计规律可循，即哈耶克所说的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众人的独立努力”。在他看来，创新来自于企业家的分散化决策，而产业政策与之相悖，是集中化决策。

张维迎认为，一项政策的后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展现出来，短期内看上去好的政策，长期看可能是坏的；政策后果的好坏不仅依赖于政策的制定，也依赖于政策的执行。

在林毅夫的观点中，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其论述有关产业政策问题的重要论据。张维迎认为，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想用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证明李斯特的国家主义。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石。”张维迎说，“但是林毅夫认为比较优势是由要素禀赋决定，且假定资本和劳动力（包括人才）在国家之间是不流动的。”

张维迎认为，在资本和人才流动的情况下，要素禀赋的重要性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降低。

“所以要素禀赋不重要，因为现实中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是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张维迎指出，因为动态比较优势主要是企业家创造的，所以企业家才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

N 学有所思

高校思政课教师要做好“园丁”和“战士”

陈正良

作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和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担负好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当代大学生，坚定其理想信念，提升其思想政治素质的职责使命。为此，高校思政课教师必须进一步强化主体责任意识，将课堂作为发挥自己作用的主要岗位阵地，既做好引领学生成长的教书育人的称职园丁，又要成为坚守高校意识形态战场的合格战士。

一是要在大学生清晰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最新成果上下工夫。高校思政课，要让学生通过课堂教学弄通弄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搞清楚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使他们真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流、发展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知。只有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位认定——是什么、价值判断——为什么、路径选择——怎么办三个基本逻辑要素和程序有清醒的认识，才能有坚定的信念和扎实的行动。这要求思政课老师必须有基本的坚守，不能因为学生对理论教育有抵触，就轻易放弃必要的坚持，用媚俗的愤青式发泄或教学娱乐化替代必要的理论“灌输”，失守课堂阵地。而是应该不断充实加强自

身的理论修养，真学真懂真信，提升诠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能力水平，不断增强教学的有效性、可接受性，引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是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的联系结合上动脑筋。思政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实效性不高，原因之一是教学内容停留在教科书理论的复述阐析上，跟不上急剧变化的形势发展、无视丰富生动的社会实践、脱离学生思想实际。思政课要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必须坚持和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紧密结合国际国内新形势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国及本省市地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紧密结合当前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紧密结合大学生思想实际，努力回答在社会急剧变革进程中学生所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和深层次问题，既不丢“老祖宗”，又要说实话、说新话。同时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的主体积极性，引导学生关注了解社会，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寻找答案。

三是在主动了解学生需求上花心思。思政课要让学生爱听乐学、有用管用，关键要从学生需求出发，直面学生关心、疑惑的问题。在教学中，有些老师只重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和国家的政治需求、宏观层面的原则问题联系起来，而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与大学生现实生活实践的关系关注不够，无视学生的思想需求的状况，导致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疏离感。在教学中，一方面，要求我们着眼于国家的政治需要，将国家、民族、社会的需要与个体的需要结合起来，将理论说服与情感交流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中，要关注大学生能力的培养、个性的完善、人格的健全和心理的健康，要关注他们的所思所想所忧，更好地使理论信仰的教育入耳、入脑。

四是在加强社会实践历练上拓新路。针对当代大学生经历单纯，缺少社会生活感知的总体情况，增加让大学生实践历练的机会，使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强化对理论的认知感悟，建立稳固对正确理论的认同。当代大学生普遍希望更多实践参与，喜欢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来体验理论的真伪并作出价值判断。很多情况下，教育者言之谆谆、费尽唇舌的理论推导，常常得不到学生认同，但在经历了实践体验后，认识就完全不一样。思政课也应具有开放视野和现代教育理念，通过拓展多种途径的社会实践，促进大学生将理论的“认知”与“践行”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深化对所授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的把握和理解，进一步增强学好、用好马克思

（作者单位：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宁波大学基地）

N 学者观察

新型城镇化 与市民化面临的问题

李 强

问题是权益上的不公平、不公正。城镇化和市民化除了指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明素质的改变，更多的应该是指让绝大多数人口享受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福利、社会保障。全世界社会福利保障做得比较好的，往往人口较少的地区，中国的社保养老金覆盖是针对13.7亿的人口规模，压力可想而知。

新型城镇化之所以新，关键是突出了以人为本，最重要的是四个方面，即作为城镇化主体的人自身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素质和社会权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四方面就是人们进入到现代文明体系的过程。

从生产方式来看，人的城镇化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正经历着全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人们面临的不仅是居住方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生产运作的体制、机制所发生的变化，即产业形式的变化。我历来认为城镇化不意味着放弃农业，其实农业也可以进入到现代产业链条，用一些技术标准去要求。除了农民、农民工进入到城镇工业、服务业就业，完成市民化的形式外，还可以让农民就地城镇化，学会和接受现代产业运营方式，这也是城镇化的重要方式，即劳动者与现代产业运营方式接轨。

人的城镇化表现在生活方式的转变上，是指农村居民进入和融入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的过程。最近一些地方政府简单地提出户籍取消来解决问题，但我认为生活方式的转变并不是户籍名称的转变，而是真正实现生活具体内容方方面面的转变。为此，需要建立城市生活方式指标体系来测量。比如华西村、高碑店，虽然名义上是农村户籍编制，但已经实现现代化生活方式转变，因此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核心要素。

城镇、城市生活也要求每一个人具有较高的公共意识和公民素质，人的城镇化也是指参与城镇化的每一个人的文明素质的形成。城镇人口聚集，人必须要接受现代文明训练。我们传统农村以及不少地方确实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在城镇、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如果不遵守公共秩序、公共卫生规范，人口密集、巨型人口的乘数效应就会造成巨大灾难。

我们国家的城乡分野不是今天形成的，有长期的历史原因。城乡分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突出

问题是权益上的不公平、不公正。城镇化和市民化除了指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明素质的改变，更多的应该是指让绝大多数人口享受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福利、社会保障。全世界社会福利保障做得比较好的，往往人口较少的地区，中国的社保养老金覆盖是针对13.7亿的人口规模，压力可想而知。

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一次抽样调查表明，70%以上的农民工不打算回乡就业，80%的农民工不愿意再选择在农村工作，老一代还好，越年轻的越不愿回乡务农，只有3.8%的“90后”农民工表示，能够或愿意回村庄务农。80%的农民工愿意选择在县级或县级以上的城市定居，而全国农村户籍人口中，有超过20%的人已经在各级城市中购房。农民想进城有两个目的，一是孩子上学，二是老人就医。而好学校、好医院都在县或县级以上城市中。未来中国城镇化、城市建设，突出县城和县级以上城市发展具有合理性。

就业是城镇化的核心，我们在城镇化的样本调研中也证明，所有做好的地方都是创造了新的产业链条，因此，城市需要做好两件事，一是提供新的产业机会，二是给农民工做好就业培训。

根据分类指导原则，分层次、分阶段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最难的在于超大城市，目前超大城市放开户籍政策仍不太现实。应根据实际情况，在多种类型的城市尝试适度降低户籍门槛和准入条件。

最近，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文件提出，要将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还提出逐步完善并落实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和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于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会起到积极作用。

实现包括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常住人口的保障覆盖，将是城市面临的重要难题。在社会保障方面，现阶段先行推进省域范围内的社会保障统筹，在此基础上，逐步制定并完善全国范围的社会保障跨省转移接续办法。

此外，农村核心是土地问题，农民最大的资源仍然是土地，包括宅基地和耕地。目前，有些地方做过土地流转和资产抵押试验，土地问题处理得好，有利于中国农村的改革，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市民化大都有益处。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来源：北京日报

观点集粹

开启“健康革命”需重视四个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罗来军在《证券日报》刊文指出，中国做好“健康革命”，当前需要重视四个问题：一是推进医疗体制改革。“以药补医”机制未破除，导致药价虚高，个别医生尽力多开高价药，医院对病人进行不必要的检查项目，不仅增加医治成本，还造成额外危害。需要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制止和根除上述问题，其关键是如何制度化建设。二是改善落后地区的医疗保障和建设。

三是健康安全的提出和应对，避免健康的破坏（健康安全）要比对健康的修复（医疗）更为重要。四是大力发展中医药与中医药产业。中医医疗人才匮乏，提供中医治疗和疗养的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国内外大规模的治病和健康需求。与此同时，中药产业水平低，野生中药材资源破坏严重，药材品质和中药质量不高。中国需要大力发展中医药科学与中医药产业，解决上述问题，适应广阔的中医药市场前景。

“互联网+”与实体经济如何互动

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程琳在《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互联网+”时代最大的特征是随时随地、快速高效、简捷方便的数据分享，这种虚拟属性又无时无刻不指向实体经济。数据爆炸时代，互联网中存储着海量的数据信息，如果不与实体经济结合，为实体经济所用，只会是冗余的垃圾。实体经济是互联网发展的基础，推动支持实体经济

的发展，则是“互联网+”发展的旨归。“互联网+”是实体经济快速发展获取数据信息的工具和平台，实体经济可以通过互联网大数据更精准地把握本领域的运行现状及未来发展。“互联网+”的未来价值，正在于它与实体经济的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将激发许多现有产业的潜力。反之，如果“互联网+”发展实践脱离了对这组共生关系的深刻把握，便会让“互联网+”沦为“空中楼阁”。

高等教育大众化需要高校多样化

中国农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李立国在《光明日报》刊文指出，普及化阶段的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教育理念，要求形成多样化的、公平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来看，高等教育分层分类和高等学校多样化，与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进程相一致，高等学校类型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必然要求。

高等教育处于精英阶段时，高等学校呈现“同质化”的特征，到了大众化阶段后，则会形成高等学校多样化。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了高等学校数量剧增、高等学校数量增加和高等学校规模急剧扩大，但还没有形成合理的分层分类，更谈不上高等学校的多样化发展，这也是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重要原因。